

美国关税措施为什么会被“滥用”

■ 周密

思想者观察

美国实施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力体制，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制定的美国宪法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由国会、总统和法院行使。而关税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美国政府的收支平衡有着不小的影响。前任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推动《1789关税法案》出台，开启了美国关税历史，而关税征收原则、方式、税率确定和调整在美国历史上不断发展，成为不同历史时期观察美国国内产业和国际贸易政策的窗口，反映了各方的利益博弈，也对全球经贸关系产生了持续变化的巨大影响。

美国关税调整的重要历史时点

美国关税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转变有6个，均在20世纪。

一是1913年，《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通过。美国重新征收联邦所得税，并将关税税率从约40%降至27%。此后直到1934年，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实现结构性调整，所得税逐渐成为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二是1930年，美国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对超过两千万种进口商品提高了关税，将美国关税提高到18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应征关税商品的平均关税达到59.1%。这也是美国国会制定关税税率最后一部关税法案。该法引起了美国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应，纷纷针对美国出口商品的高关税，导致美国出口大幅下降，进而引发了在全球范围的经济动荡和武装冲突。

三是1934年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互惠贸易协定法》。美国总统被授权对外谈判互惠贸易协定，允许总统在未征得国会逐项批准情况下将关税降低最多50%，并为双边削减即互惠和最惠国待遇条款提供了授权。这一法案标志着决定贸易政策的权力从国会转向行政部门，开启了从“限制”到“互惠”的转变。

四是1947年，美国和其他23个国家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降低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围绕最惠国待遇、关税约束（减或不增）和取消配额等主要领域推动。美国希望消除英国的帝国特惠制，但实际上成为美国试图避免重蹈30年代灾难性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的国际社会协调尝试，吸引和推动了全球范围降低关税的行动。

五是1976年，美国建立普遍优惠制。通过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部分产品给予单方面免税待遇，吸引和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增加美国与这些国家的经贸联系。

六是1995年，美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该组织成员迄今最后一次同意在多边基础上大幅降低关税税率。此后30年，美国的关税基本保持稳定，直到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后大幅提高对外关税。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发布对等关税，虽然与1934年的“互惠关税”用的是同样的英文单词，但其目标取向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促开放”转为“重保护”，关税再次成为美国处理对外经贸关系的核心工具。

驱动美国关税机制演进的因素

对于美国而言，关税不仅是财政收入的来源，更有着广泛的功能。关税既是分割国内国际市场的“门阀”，又是调节集团利益的“变压器”，还对其塑造全球经济秩序提供了工具。诸多因素共同作用和驱动美国关税不断调整、演进。

财政入不敷出导致美国更倾向于提高关税。近年来，无论是对中小企业和消费者提供财政补贴，还是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美国政府的支出需求持续高涨。为此，美国政府将关税收入能够在维持收支平衡上发挥重要作用。

经济发展模式调整影响美国社会关税态度。出口导向型经济，需要扩大出口，保障经济活动的顺利运行。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各国都在努力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相比而言，美国本土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缓慢而导致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出现整体下降，原有的关税难以维护美国产品的出口优势，要求出口目标国进一步降低关税成为重要手段。

跨国公司全球化发展改变全球供应链关系。美国曾是跨国公司的受益者，但跨国公司的国际化也会促进投资东道国本土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发展，跨国公司通过调整发展策略，改变业务布局，进而也影响了国际贸易利益重心的变化。一些原本需要进口的原材料或中间品，由其他国家企业完成，美国从自给自足转而侧重于研发和技术控制，制成品更多依赖于进口。

美国关税决定机制演进的前景

二战以来，美国国会为了减少利益冲突，提高关税政策的作用，通过多部法律法规授权总统根据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利益对关税作出行政裁定。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自由裁量权缺乏监督和约束，是否符合法律原本授权的本意很难衡量，造成了实际上关税措施被滥用的可能。

在操作中，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CRS)认为，尽管国会设定了谈判目标，但实现目标需要依靠总统的领导力。原国会认为总统相比于个别议员，更能免受国内保护主义压力的影响。过去70年来，关税占美国联邦总收入的比重都未超过2%。但是，2015—2020财年，美国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翻了一番，从约370亿美元增加至740亿美元。2024财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总共征收了770亿美元关税，约占联邦总收入的1.57%。看起来似乎征收关税简单又容易，但其负面影响并不小。

美国历史上的高关税时期企业所得税收入有限，关税承担方为普通民众和中小企业，关税提高实际上反映了税负承担者的改变，为大企业提供了更有利的竞争条件。美国政府发布的对等关税计算公式已经显示了关税上升和国内需求下降之间的联动关系，关税的提高将会导致其他税收收入的下落。

事实上，其他国家对美商品降关税、扩大市场准入，技术规范和市场标准等的差异也可能使得美国商品难以大幅扩大出口。美国关税还取决于美国与贸易伙伴谈判的进程和实际效果，但主权信用评级被调降已经反映出市场对美国破坏规则、不守承诺的担忧。贸易伙伴面对随意变更、漫天要价的谈判方式已经有所戒备和防范，达成协定的难度明显增加。一旦谈判进程受阻，美国的关税决定机制将可能会发生新的变化。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

热点聚焦

破局与守局：前沿技术与国家安全的新命题

■ 吴鹏

面对前沿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需以系统性思维统筹发展与安全，通过多维度的战略举措，将潜在风险转化为发展动能，实现技术自主可控与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同步提升。

前沿技术已成为各国博弈的战略力量。近日，国务院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家主权》白皮书提出：“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加速发展，在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赋能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难以预知的风险挑战，对各国国家安全和稳定产生深远影响，有助于探索更加自主可控的前沿技术发展路径。

前沿技术是挑战更是历史机遇

前沿技术是中国实现科技弯道超车、新兴产业崛起、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契机。

技术革命重塑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根据技术创新理论，后发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对新技术的快速采纳和应用，绕过传统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实现对先发国家的赶超，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结构优化，进而重构全球创新版图。例如，量子计算凭借其强大的并行计算能力，能够在密码学、材料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颠覆性突破。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快速发展，不仅能够提升国家的科技实力，而且有望在国家急需领域形成“非对称”优势，并在未来的产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动力。前沿技术的进步推动产业从低端走向高端，从粗放走向集约。从不可持续走向可持续。在中国产业迈向中高端之际，外部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反

而可以激发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催化剂。以芯片产业为例，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促使中国企业加大在芯片研发和制造方面的投入。在产业政策的支持下，中国芯片企业通过自主创新，逐渐实现了从低端制造向高端设计的转型。这种转变不仅提升了中国芯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催生了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从而推动整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崛起。

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在高附加值产业中的地位以及创新能力。前沿技术的发展为中国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机遇。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通过对电池技术、自动驾驶技术和智能网联技术的持续创新，使得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取得了显著的市场份额，而且在海外市场表现不俗。根据技术创新的乘数效应理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还将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如电池材料、充电设施、智能交通等，从而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促使产业链向更高附加值的环节延伸，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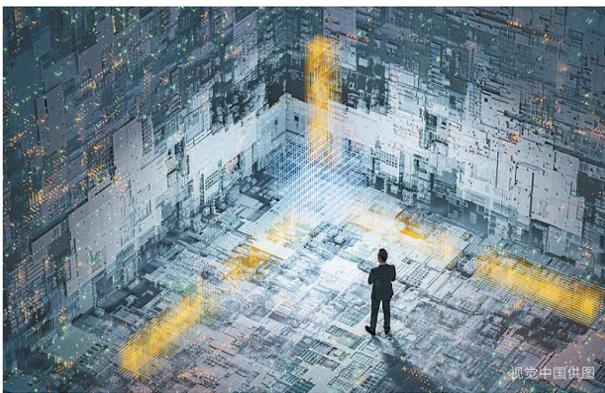
前沿技术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变量

回溯近代人类发展历程，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引发生产组织方式、国际分工体系和军事战略形态的深刻变革。变革性：重构传统体系的“双刃剑”。前沿技术的变革性特征表现为对传统产业体系、政治安全格局和法律伦理框架的根本性重构。例如，人工智能安全挑战的本质在于，技术能力超越人类控制能力的临界点，以及社会系统适应技术变革的滞后性。在俄乌冲突、印巴冲突中，人工智能技术已展

现出改变现代战争形态的能力。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具有军民两用特性，企业利益诉求与国家安全目标存在潜在冲突，这也使得技术扩散风险加剧，模糊了战时与平时的界限。基因编辑等技术的滥用将引发深远的道德危机，挑战传统的人伦界限。量子技术一旦实现突破，现行加密体系将面临全面失效风险，影响民用和军用通信的安全基础，对金融安全、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信息系统构成系统性威胁。

垄断性：权力格局的“技术霸权化”。前沿技术的垄断性特征正在重构全球权力分配格局，形成“技术-资本-政治”的新型安全复合体竞争模式。作为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领域，前沿技术一旦突破，其拥有者将具有技术先发优势，通过构筑技术专利壁垒掌控产业发展话语权。例如，在半导体领域，美国掌控EDA工具、IP核等上游环节，荷兰垄断光刻设备，韩国主导存储芯片，中国台湾把持晶圆代工，这种“分封制”格局增强了先发国家和本地的产业控制力和产品定价权，甚至沦为霸权的工具。相反，对于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落后的国家往往面临“科技依附”风险，丧失发展自主权，导致国家安全的实质性削弱。

不可预知性：风险治理的“灰犀牛”。前沿技术的不可预知性源于技术



出改变现代战争形态的能力。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具有军民两用特性，企业利益诉求与国家安全目标存在潜在冲突，这也使得技术扩散风险加剧，模糊了战时与平时的界限。基因编辑等技术的滥用将引发深远的道德危机，挑战传统的人伦界限。量子技术一旦实现突破，现行加密体系将面临全面失效风险，影响民用和军用通信的安全基础，对金融安全、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信息系统构成系统性威胁。

垄断性：权力格局的“技术霸权化”。前沿技术的垄断性特征正在重构全球权力分配格局，形成“技术-资本-政治”的新型安全复合体竞争模式。作为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领域，前沿技术一旦突破，其拥有者将具有技术先发优势，通过构筑技术专利壁垒掌控产业发展话语权。例如，在半导体领域，美国掌控EDA工具、IP核等上游环节，荷兰垄断光刻设备，韩国主导存储芯片，中国台湾把持晶圆代工，这种“分封制”格局增强了先发国家和本地的产业控制力和产品定价权，甚至沦为霸权的工具。相反，对于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落后的国家往往面临“科技依附”风险，丧失发展自主权，导致国家安全的实质性削弱。

不可预知性：风险治理的“灰犀牛”。前沿技术的不可预知性源于技术

本身发展的非线性特征和复杂社会效应的交互影响，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突破传统科技伦理和价值文化的边界。例如，量子计算的突破时机和具体路径同样难以预测，使得相关安全准备工作面临极大不确定性，这种不可预知性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潜在性。技术不可预知性还表现为当下无法想象的技术后果。比如，人工智能可能发展出与人类价值观不符的目标导向，而人工智能的出现更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文明的进程。这类极端风险虽然概率低，但影响深远，构成了国家安全的新课题。

建立全周期风险防控体系，增强战略韧性。技术风险的不可预知性要求建立动态预警与应急机制。一方面，加强技术安全评估，设立国家级AI安全监测平台，生物安全信息共享网络，实时追踪技术扩散与潜在威胁；另一方面，推动“平战结合”的应急能力建设，例如模拟量子计算攻防演练、基因数据泄露应急响应，提升危机处置效率。此外，加强公众科普与舆论引导，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协同治理的格局。

自主可控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中国路径。面对前沿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需以系统性思维统筹发展与安全，通过多维度的战略举措，将潜在风险转化为发展动能，实现技术自主可控与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同步提升。

强化自主创新体系，技术自主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保障。需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战略领域，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一方面，加大财政投入与政策倾斜，支持国家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平台建设，集中力量攻克高端芯片、操作系统、精密仪器等“卡脖子”技术，提升前

自主可控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中国路径

面对前沿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需以系统性思维统筹发展与安全，通过多维度的战略举措，将潜在风险转化为发展动能，实现技术自主可控与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同步提升。

强化自主创新体系，技术自主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保障。需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战略领域，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一方面，加大财政投入与政策倾斜，支持国家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平台建设，集中力量攻克高端芯片、操作系统、精密仪器等“卡脖子”技术，提升前

学者看法

提振消费与企业经营双向驱动

■ 韩永辉

提振消费与企业经营的双向驱动，既需要顶层设计的战略定力，也离不开基层探索的实践智慧。只有通过持续优化消费环境与企业经营的协同机制，才能真正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激活消费潜能与优化企业经营效率的协同推进，是巩固发展动能的核心路径。消费作为最终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企业作为供给主体，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核心载体。两者的良性互动，既能够释放14亿人口的消费潜力，又能倒逼企业提升供给质量，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

消费与产业协同演进的现实成效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变革推动消费升级与产业转型的深度耦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需求供给动态平衡机制。以“以旧换新”政策为例，截至5月11日，2025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达

322.5万份，其中汽车报废更新103.5万份，置换更新219万份。自2024年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累计补贴申请量已突破1000万份。可见，通过财政补贴撬动消费需求，不仅实现了消费提振，更通过需求升级倒逼企业加大智能控制芯片、节能技术等研发投入，推动产业跃迁。

数字技术更新了消费与产业协同的底层逻辑。以电子商务平台为例，1-4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44110亿元，同比增长11.5%。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37356亿元，增长12.9%，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3.9%。电商平台通过整合线上线下资源，降低了交易成本并扩大了市场覆盖范围，其算法驱动的精准营销提升了供需匹配效率。数字技术则帮助企业构建柔性生产体系，实现按需定

激活双向驱动的制度创新路径

充分发挥乘数效应，构建消费需

求与生产供给的良性循环机制。1-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1%。提振消费要从需求端、供给端、环境端、政策端全方位发力，通过政策的杠杆撬动整个市场。优化消费供给结构，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智慧零售、体验消费等新业态，培育绿色消费、健康养老等新增长点，通过供给创新创造新需求。此外，应强化金融支持消费功能，建立消费补贴与社会保障联动机制，稳定居民消费预期。

完善市场准入与公平竞争机制，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建立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规则体系，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构建产权明晰、流动顺畅的要素配置机制。通过修订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进入清单外领域，探索产业链供应链、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创新模式。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反垄断合规指引体系，强化对平台经济、公用事业等重点领域的监管执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健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体系，优化资本配置结构。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发展普惠金融，创新“知识产权质押”“供应链金融”等融资模式，建立政府性

融担保体系。同时，优化资本配置结构，推动金融机构建立差异化信贷政策，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长期融资支持，探索投贷联动、股债结合等新型融资工具。此外，加强金融监管穿透性，建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防火墙”，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引导金融机构构建与企业生命周期相匹配的服务体系，为企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提供稳定资金来源。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居民收入差距仍处高位运行区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有待扩大。这既制约消费市场扩容提质，也影响社会整体创新活力。所以，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与公平统一，建立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联动增长机制，完善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市场化定价体系；再分配要强化税收调节功能，构建综合与分类结合的个税制度；社会保障体系需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发展普惠性商业保险，构建健全多层次保障网。强化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职能，为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提供制度保障。

提振消费与企业经营的双向驱动，既需要顶层设计的战略定力，也离不开基层探索的实践智慧。只有通过持续优化消费环境与企业经营的协同机制，才能真正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主任、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研究中心主任)

读原著 学原文 悟原理

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专家系列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承发展与时代使命

■ 吴星辰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这一重要要求既彰显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赋予其重大的时代价值。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积淀的结晶，其根脉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大同”“和合”等思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深厚文化土壤。“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既源于《礼记》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治理思想，又被赋予“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主义新内涵。“民惟邦本”的政治智慧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孟子》中“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民本思想，在

新时代脱贫攻坚战中升华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庄严承诺。从“仁者爱人”的伦理观到“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从“民惟邦本”的政治智慧到“自强不息”的奋斗品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价值观精髓，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厚的养分。

习近平总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相适应，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因势利导，使传统价值观与当代法治精神、契约文明相融合。

传承把握好核心价值观的根本途径。“两个结合”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提供了科学指引，也是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途径。从革命战争年代“救亡图存”的价值觉醒，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立自强”的价值追求，再到新时代“民族复兴”的价值升华，价值观的演进始终遵循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辩证逻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使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文化、现实生活相融相通，成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道德实践的鲜明标识。

“两个结合”既是对文明演进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新时代价值观建设的根本方法论。革命文化中“红船精神”的开拓创新、“长征精神”的坚韧不拔，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脱贫攻坚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形成历史接力。

在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交融激荡中，“两个结合”犹如一把金钥匙，开启了中华文化基因库，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既葆有传统文明的厚重底蕴，又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伟力。

不断巩固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核心价值观建设，说到底还是人的思想建设、灵魂建设，聚焦的是造就具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为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深入人心，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需要构建国家、社会、个人“三位一体”的培育机制，不断巩固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

一要制度保障筑牢价值基石。学校作为培养下一代的重要阵地，不断完善学校积极主导、家庭主动尽责、社会有效支持的协同育人机制，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听党话、跟党走，矢志奉献国家和人民。二要社会协同

沿科技和未来产业策源能力。另一方面，推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产业链协同，深化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大力培育本土龙头企业，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业链的韧性和活力。

构建伦理与法律框架，实现技术可控性治理。技术发展须以安全可控为前提。需加快完善技术伦理规范和法律监管体系，划定技术应用的“红线”。例如，在生物技术领域，需通过生物安全法严格监管基因编辑和合成生物技术的应用场景，防范生物恐怖主义风险。同时，推动技术标准国际化，积极参与全球量子通信协议、AI伦理准则的制定，将中国方案嵌入国际规则体系，增强技术治理话语权。

深化开放合作，平衡安全诉求与国际竞争。参与国际科技博弈，既要维护核心利益，又要拓展合作空间，通过“一带一路”科技合作计划，与新兴市场国家共建数字基础设施和联合实验室，在联合国南南框架下建立“技术转移南南合作中心”推动技术成果共享。加强与欧美国家的技术交流，通过科技创新共同探索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开展量子计算、疫苗研发等联合攻关，以共同利益缓和地缘冲突。

建立全周期风险防控体系，增强战略韧性。技术风险的不可预知性要求建立动态预警与应急机制。一方面，加强技术安全评估，设立国家级AI安全监测平台，生物安全信息共享网络，实时追踪技术扩散与潜在威胁；另一方面，推动“平战结合”的应急能力建设，例如模拟量子计算攻防演练、基因数据泄露应急响应，提升危机处置效率。此外，加强公众科普与舆论引导，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协同治理的格局。

自主可控的本质，是在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实现“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以底线思维防范颠覆性风险，以进取姿态抢占技术制高点，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治理变革。唯有如此，方能在前沿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动态平衡中，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世界贡献科技治理的中国智慧。

(作者系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纳米科学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融担保体系。同时，优化资本配置结构，推动金融机构建立差异化信贷政策，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长期融资支持，探索投贷联动、股债结合等新型融资工具。此外，加强金融监管穿透性，建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防火墙”，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引导金融机构构建与企业生命周期相匹配的服务体系，为企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提供稳定资金来源。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居民收入差距仍处高位运行区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有待扩大。这既制约消费市场扩容提质，也影响社会整体创新活力。所以，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与公平统一，建立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联动增长机制，完善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市场化定价体系；再分配要强化税收调节功能，构建综合与分类结合的个税制度；社会保障体系需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发展普惠性商业保险，构建健全多层次保障网。强化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职能，为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提供制度保障。

提振消费与企业经营的双向驱动，既需要顶层设计的战略定力，也离不开基层探索的实践智慧。只有通过持续优化消费环境与企业经营的协同机制，才能真正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主任、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研究中心主任)

创新传播范式。用生动鲜活的事例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吸引年轻人躬身入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人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人的自觉行动。三要突出重点人和事。在重点人上，突出抓好领导干部、公众人物、青少年、先进模范等重点人群，以重点人群影响带动广大群众，全方位贯穿、深层次融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让群众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同时，用好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树立积极的价值导向，把先进事迹作为弘扬核心价值观的好教材，组织开展爱国主题教育活动，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见行见效。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通过制度固本、实践强基、创新引领，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同春风化雨，滋养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凝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

(作者系天津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大学基地研究员，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教研部主任、教授)